

复原力理论视角下流动儿童的问题与发展研究

陈 珊,李其原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在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其结构日趋呈现“家庭化”。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身份的特殊性,流动儿童面临较强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城市融入呈边缘化状况。基于复原力理论视角,以环境—个体策略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流动儿童所面临的健康安全风险、社会交往风险、人格心理风险及教育学习风险纳入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风险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物质基础及价值观念、社区居住条件、学校管理体制、社会政策及文化氛围等。新时期提升流动儿童复原力水平,解决其问题,促进其发展,必须从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对应结构出发,提出从复原力的两个要素即个体的特质及能力着手,构建流动儿童的保护性因素,以形成对风险因素的制衡或抵消,具体而言可以从内力发动途径——流动儿童价值转变与集体赋权的微观层面,外力发动途径——家庭功能恢复、学校教育创新及社区教育支持的中观层面,完善体制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宏观层面提出保护建议。

关键词:流动儿童;复原力;风险因素;保护因素;赋权

中图分类号:B844;C91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5)04-0102-11

流动儿童问题是伴随城市化出现的,是我国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产物。人口的大规模持续流动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也顺势产生并迅速扩大。流动儿童由于其成长发展的外部环境系统遭到破坏,其体质健康、心理人格和社会交往等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若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不仅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发展,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流动儿童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学界的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层面的服务实践,但二者相比,后者明显偏少。纵观现有研究,主要是以政府、学校、社区或家庭为主体,从健康、安全、社区融入及教育等方面分析流动儿童的现状和主要问题。这些成果为流动儿童相关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GL051)

作者简介:陈珊(E-mail:77196252@qq.com);李其原,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191895426@qq.com)

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范式,但也有待从新的出发点加以探讨。因此,本文从复原力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究流动儿童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和原因,及风险解除的路径。

一、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

(一)复原力研究理论假设

人在环境中,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强调社会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就阐释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将人放在环境系统中,考察其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该理论揭示了家庭、社会系统对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影响。复原力理论也是将个体在成长发展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前提,充分运用优势视角寻求个体的改变和发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或青少年却有着良好的适应和发展,复原力研究便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复原力理论的研究至今虽已有四十多年,但由于其自身的鲜明的文化内涵,因此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域因文化风俗和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差异可能产生不同的定义,同时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及研究视角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对复原力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对复原力的不同解读主要包括这三种向度:品质,过程,结果。Wolin 等人认为复原力是一种品质,使个体即使深陷逆境却能避免产生某些问题^[1];Ladd 认为复原力是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而 Masten 则认为应视复原力为一种适应良好的结果^[2]。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复原力的界定可以看出,复原力的本质核心就是个体所具备的抵消困境影响的特质或能力,而究竟视其为特质还是能力,笔者认为:复原力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会受到个体及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而产生相应变化,而作为能力的复原力恰好符合这一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复原力就是指个体抵抗困境,消除其负面影响,达到良好适应结果的能力。包括积极的社会认知、处理问题的效能因素、获取并合理利用使自身恢复健康状态的外部资源的能力,这些要素使得个体在面临困境时能够做出理性的、正向的选择,并做出恰当的处理,从而产生正向的结果。

(二)复原力研究分析框架

目前,对于复原力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复原力的起点、作用过程及作用结果形成了五种较为成熟的框架模型:行为目标模型、复原力层次模型、环境—个体策略模型、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以及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笔者将以 Rutter 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探讨流动儿童的问题与发展。环境—个体策略模型提出了人的复原力形成于个体与环境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同样也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运作并产生结果。该模型特别关注环境对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强调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个体增能。基于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关系,它还进一步对保护性机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四种应对策略:第一,营造补偿性的环境降低风险的影响;第二,采取补偿性措施减少该风险带来的消极连锁反应;第三,增强个体的自尊感和效能感;第四,为个体提供获取经验的机会。(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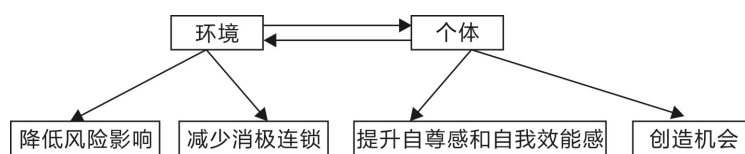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个体策略模型^[3]

根据复原力理论可知,个体的复原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对应结构,结构关系中二者的作用此消彼长。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面临各种风险,但可以构建保护性因素来减轻风险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在其成长过程中,若保护因素较为完整,将较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甚至即便风险发生,也能及时有效地缓解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 Luthar 所说:虽然抗逆力理论涵盖多层次的内容和特征,但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风险因素及其调节机制,即保护因素的构建^[4]。因此,本文从复原力理论视角出发,将流动儿童纳入到“环境-个体策略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中,分析当前流动儿童所处环境及对其自身的影响,以探究风险防御机制和保护机制的建立,从而推动流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二、流动儿童的风险因素分析

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城市建设的需要涌向城市,流动儿童也随其流入,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交替作用,其城市融入呈现边缘化状态,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因此,下文以复原力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并根据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通过分析总结以往关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的调查研究,将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健康安全风险、社会交往风险、人格心理风险及教育学习风险^[5]。

(一)健康安全风险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社会人口流动的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离土不离乡”的间歇往返流动不同,当前人口流动逐渐呈举家和携带子女流动的态势。然而,随即而来的流动儿童最基本的生存健康、生活质量等问题却相当严峻,健康风险成为了流动儿童面临的首要风险,主要表现为无法及时获取疫苗接种等健康资源、居住条件恶劣、饮用水不达标、卫生条件差等^[6]。不仅如此,由于大部分流动儿童家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治安环境较差、犯罪率较高,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得流动儿童遭遇事故和侵害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在被拐卖儿童总数中,流动儿童所占比例最大^[7]。陈丽等^[8]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儿童群体相比,在遭受跌落、烧烫和动物伤害等风险中,流动儿童的风险发生率最高,达 40.9%。

流动儿童的健康安全受到多方因素的威胁,既有来自于家庭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也有社区环境及设施条件的制约:

首先,从家庭层面看,第一,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的健康安全有着深刻影响。农民工群体普遍具有“三低”的典型特征,即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且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即令正当生长发育阶段的流动儿童的营养健康需求缺乏很好的物质条件的满足,进而给体质健康带来潜在的危机。第二,家庭的健康安全意识对其健康安全也有作用。由于文化水平低,知识面较窄,其健康安全意识薄弱,这不仅直接为流动儿童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同时也会影响流

动儿童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一些基本的疾病控制和个人卫生知识在流动儿童中的普及并不理想,且总体情况低于户籍儿童^[9]。

其次,从社区环境与硬件设施方面看,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作为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过渡、“边缘”地带应运而生,兼具城市和农村的某些特点,同时因就业机会多,物价水平特别是房租较低,且管理相对宽松,受到了农民工的普遍青睐,成为进城农民工主要的聚居地。一方面,这里人口密度高,生活环境差,容易引发疾病,并且体育场地、器材、设施不齐全,呈现“少、旧、差”的特点,这些都对流动儿童的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强、人员复杂、安保设施缺乏、治安条件差、犯罪率较高等是城乡结合部的典型特征,在如此的社区生活环境下,年龄较小、风险应对能力较弱的流动儿童又因缺乏父母的妥善监护而更容易遭遇意外事故或侵害。

(二) 社会交往风险

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是指他们在城市空间里生活、学习过程中的人际互动。良性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对于流动儿童自尊、自信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但很多流动儿童无法建立积极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其社会交往呈现残缺状态。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人际关系不如城市儿童;城市儿童比流动儿童更容易在新场合结识新朋友^[10]。

究其原因,不仅包括来自学校、社会的排斥,其家庭的教育方式及家庭内部关系结构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家庭教育方式显著影响着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父母鼓励下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社会交往的频率更高^[11]。多数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方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缺乏民主和关怀,流动儿童父母对于孩子的管教方式一般都是打骂,很少进行“三观”的教育引导,使得流动儿童未能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和目标。不仅如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否也是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的关键影响因素。俗话说:“贫贱夫妻百日哀”,流动儿童的父母更有可能因为经济问题或生活琐事而引起争执,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父母经常吵架比重为 9.63%,而城市儿童父母为 7.73%;在吼骂、忽视孩子方面,流动儿童的比重分别比城市子女高 6.36%和 2.79%^[12]。这些对流动儿童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态度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由于遭受歧视和排斥而产生的易敏感、易愤怒情绪,使其要么冲动行事,与他人产生冲突,要么恐惧社交,与外界格格不入。

另外,地区语言差异或普通话不流利导致的交流困难以及家庭频繁流动对于同伴关系的建立也有负面影响^[13]。这种负面影响表现在:当流动儿童不能与本地儿童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时,一种自发的“同性相吸”的关系结构将会形成,即有着相似迁移经历的流动儿童会结成亲密的同伴关系,他们在身份地位、背景经历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较小,能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无可否认,这将有利于其社会化的良好发展,但是,这样一种以流动儿童为主体的同辈群体反而会强化流动儿童自身地位的边缘性。因此,如若没有适当的干预,这种同伴关系可谓弊大于利,将增加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风险。

(三) 人格心理风险

在农民工涌入城市的浪潮中,大量流动儿童不得不来到陌生复杂的城市,他们作为这一特殊的群体,由于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身份地位等多方面的差异,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遭受着更多的社会排斥,因此极易产生人格缺陷和行为偏差,社会适应困难重重,譬如性格孤僻、心理承受力低下等;同时,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困境也可能引起社会角色混乱、能力弱化、责任

感缺失等后果^[14]。

1.流动儿童的自卑心理

自卑心理,则是个体过于自我否定,对自身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这样会导致人们失去交往的勇气和信心。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与之伴随的是个体对于摆脱自卑的补偿机制的追求和选择,一旦补偿方式选择失当,将成为个体成长发展的严重障碍。在一项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格特征的调查中^[15],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缺乏自信、敏感、依赖性强。对此,笔者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剖析其自卑心理形成的原因:

首先,流动儿童的“自我——漂泊感”。流动儿童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中,需要一段适应期。在此期间,由于父母工作的不稳定性,他们居无定所,常常会感到漂泊无依,恐惧新环境,没有归属感;同时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源及时疏导其不安情绪,并且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也偏低,因此,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其次,流动儿童的“外在——被孤独”。第一,从社会层面上看,许多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存在认知偏见甚至歧视。姚远等人的实地调查发现:40%的流动儿童曾因为自己是外地人而被瞧不起过;20%的城市儿童家长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带流动儿童到自己家里玩,理由是“有些外地人偷东西”、“素质低”^[16]。如果个体缺乏社会支持,社会关系就容易出现疏离和孤立^[17],加剧孤独自卑的心理困扰。第二,从学校层面看,流动儿童因为不在学校学籍管理的范围之内,管理中存在诸多不便和麻烦,因此,多数学校一般不愿意接收他们,即使接收了也对其采用放任式的教育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的学习进步造成了影响,长此以往,使得他们缺乏自信,过低评价自己的能力,过分地把失败归咎于自己,自卑心理严重。

2.流动儿童的焦虑问题

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它是个体内在的一种不安与恐惧的精神状态,其外显特征表现为个体主观上的紧张、忧虑、不愉快,甚至痛苦难以自制,而这些情绪反应缺乏客观明显的诱因,或者说是无根据的,是个体对于即将到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或危险的过度认知。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焦虑情绪都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焦虑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素:一是病理性特征,二是对个体正常的社会功能造成影响。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由于长期处于孤独、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他们经常夸大自己的缺陷,将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在其行动上表现为胆怯,没有耐心,轻言放弃等等,也很难建立起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换句话说,流动儿童理所当然的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然而这却与他们因为个人及环境的多重限制而形成的有限的水平形成反差,造成习得性无助,使得他们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情绪之中。

(四)学习教育风险

流动儿童作为城市融入中的边缘化社会成员,相关政策理应对其有所导向,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虽然2011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再次强调“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辅,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根据衡量教育公平的三个层次标准可以发现,流动儿童在入学机会、教育过

程和学业成就等方面与流入地常住人口子女相比,均处于劣势地位,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

首先,从入学机会来看:第一,门槛太高,流动儿童被拒之门外。这集中表现在流动儿童入读城市公立学校面临的政策限制上,流动儿童若要到城区读书,必须符合基本的入学条件并且证明齐全,而调查显示,所有证件都能提供的农民工家长仅占 9.03%,流动儿童在城市所有区内就读可以免费入学的不到 10%^[18]。第二,费用太高,流动儿童被迫放弃。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在 2006 年免除了符合条件的非京籍借读生的“借读费”,在 2010 年已实现了学杂费、教材费全免的政策调整,这意味着流动儿童等非京籍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方面将享受“同城待遇”。但事实上,城市公办学校存在很多隐性的收费项目^[9]。这些政策只做到了表面意义上的平等,实际却缺乏现实意义上的公平。

其次,从教育过程来看:流动儿童因为不属于学校学籍管理范围之内,且受到流入地常住人口的普遍歧视和排斥,学校和老师对他们的态度通常是不管不顾、放任自流。他们通常被安排在不起眼的地方,不受到关注重视甚至直接被忽视;另外,由于这些流动儿童缺乏学籍记录,他们的评优评先、升学等资格有时也无法享受。

再者,从学业成就来看:以流动儿童升学问题为例。在现实生活中,流动儿童的升学问题就如同一条鸿沟。他们不但不能参加流入地的升学考试,只能通过“借考”进入当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与劳务行业相对应的专业;而且如果他们回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又面临着教学内容不同、考试重点有别的难题。因此,他们会失掉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会成为二代农民工。

流动儿童的学习教育之所以呈现如此状况,究其本质,仍然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两级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导致求学之路门槛高。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基本上仍实行“一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即适龄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主要与其户口所在地政府负责管理,而非流入地政府。这一体制的弊端在于:一方面,流出地与流入地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对接机制,两地政策不一使得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办理入学手续时遭遇许多麻烦,耗时费力;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在流入城市的同时,流入地所提供的教育资金并没有随之流动,他们又无法享受流入地的费用补贴,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教辅费”,让他们不堪重负,难登求学之堂。

虽然我国正在不断努力的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并且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个别试点省份已经开始推行教育券的实施办法,由财政部门将流出地的经费补贴划拨到流入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儿童“被遗忘”的尴尬,但这些改革显然是不够的,就拿教育券来说,在其实施过程中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如何规定适用范围且保证公平;如何克服流动儿童家庭频繁流动,减少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等众多难题上仍需不断探索解决。

三、应对风险的保护性因素构建

(一)内力发动途径——流动儿童自身赋权

虽然流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风险和问题,但少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流动儿童也蕴含着许多正向的心理品质,如流动儿童能吃苦耐劳、坚强、节俭、学习刻苦^[20];不仅个人掌控感强,而且乐观^[21]。这些正向的心理品质是流动儿童良好心理支持的源泉,可以帮助他们

有效应对压力和困境。因此,在探求流动儿童风险问题解决的内在驱动力上,将借用赋权理论的优秀观点,不仅要帮助流动儿童发现自身的优势,更要注重其自身的赋权,使其具备获取并合理掌用资源的能力,帮助其最大限度的利用自身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掌握自己的生活,以培养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良好适应。

1.流动儿童转变价值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根据赋权的层次,流动儿童要转变自身价值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赋权,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对自身的认知和调适,流动儿童要不断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增强自信心;二是对人际关系的正确认知和恰当处理,在此过程中,流动儿童要逐步打破对城市人的偏见,逐步提高对他人的理解力,学会如何接纳他人、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三是对政治或政策的理解,流动儿童要尽可能的丰富自己,扩大自己的视野,尤其是要树立“公民意识”,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积极了解国家政策,维护自身权益。

2.流动儿童积极寻求集体权利,相互赋权

流动儿童群体的集体意识和团结合作对保护性因素的构建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派恩所提到的那样:“已经实现赋权的个体可能只是从他们所在的被压制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同样被压制的人那里获得权力与资源去改变自己的弱势生存状态,而没有从更大、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权力与资源。如果这样,在一个社会或政治资源有限的地方,赋权过程并没有能将受压迫、被剥夺的无权势者团结起来,而只是让他们相互倾轧而已。”^[2]因此,要防止流动儿童之间的相互欺压,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一方面,参与沟通和互动,共同分享感受,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发展面对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适应危机情景,促进个人成长;另一方面,培养集体意识,在集体行动中形成包括对自身及群体的境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正确认知,培养反思性主体意识,促进思想解放,运用整体性思维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寻求资源,推动整个流动儿童群体处境状态的改善。

(二)外力发动途径

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之间的博弈最终决定了流动儿童的复原力水平,从复原力的定义来看,个体所具备的能力对于构建保护性因素以形成对风险的制衡与抵消是极其重要的,若社会信念与效能因素中的任意一个存在不完善或者缺失,然而又没有替代性的支持资源形成补偿的话,就将大大提高流动儿童风险发生的概率或是增强消极影响。因此,流动儿童保护性因素的构建除了其自身要具备积极的心理品质以外,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和相应的保护性手段,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完善的制度支持和心理辅导,畅通的沟通渠道和优化的沟通方式,协调的家庭功能及良性的亲子关系等等。根据提供主体的不同,可将这些外部保护性因子作不同层次的划分,主要归纳为中观的学校、家庭及社区,宏观的社会服务及政策支持。

1.中观层面

第一,增强流动儿童家庭的功能建设。长期以来,关于流动儿童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都缺乏家庭视角,忽视了家庭作用的发挥,而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儿童获得支持的最直接的来源。因此,优化家庭的教育方式、内部关系结构及沟通方式等,提升家庭的情感、教育和保护功能非常关键,并且还要引导流动儿童家庭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生活观、安全观,从

而促进流动儿童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

第二,增强社区支持力度,完善社区服务。一方面,加强社区对流动家庭的支持,增进流动家庭的社区融入,为流动儿童做好榜样,引导他们对人际交往对象作出正确理解,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有适应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从而积极主动地融入并进一步构建更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一般可分为知识技能教育、思想价值教育、反思性意识教育,对于流动儿童,可开展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首先,在知识技能教育方面,可以从普及健康安全知识、讲授人际交往技巧、了解社会政策等方面入手,开展一些诸如自我安全保护知识讲座、普通话训练班及相关政策的趣味讲座等等;其次,在思想价值教育方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塑造其积极正向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品质,培养良好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提升其社会责任感等;最后,在反思性意识教育方面,重点则应放在社会参与意识的培养以及对自身、整体的反思能力的提升上,这也是甘炳光教授所提到的解放式教育^①的内涵。

第三,创新学校教育体制,推动流动儿童“去标签化”。(1)以全体儿童在成长发展中都会面临种种风险困境这一基本现实为出发点,抓住教育改革这一契机,将复原力教学嵌入到现有的教育体制中,通过系统的教育指导帮助流动儿童建立良好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正确判断,从而构建积极正面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网络,提高他们对风险的处理能力,这不仅可以为流动儿童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同时有利于整个群体的发展。(2)学校还应大力推动流动儿童“去标签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无形中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社会地位及价值评价上的差异,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描述一般是消极负面的。然而,虽然在心理行为上,流动儿童产生问题的概率相对较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流动儿童尚未出现相应问题;不但如此,流动儿童自身还具备许多积极正向的心理品质,因此,流动儿童“去标签化”极其重要,而首要场所就是学校。学校应加强对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的教育宣传,倡导对流动儿童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尤其是教师要端正态度和认识,以平等、关爱的态度来对待流动儿童;同时,避免过多的主观评价,善于用欣赏的眼光去发掘他们的优势,充分发挥“期望效应”的作用,提升流动儿童学习交往的热情及自信心。(3)学校还可以组建一些社团并开展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了解,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及城市生活,例如,可以组织一些发展爱好、拓展兴趣的社团协会,开展一些类似于“成长相伴”的主题活动,将流动儿童置于集体环境之中,以“一帮一,一带一”的形式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融入学校,尽量减少校园环境中的排斥与歧视,为流动儿童营造一个支持性的学校环境^[23]。

2.宏观层面

第一,推进体制的转变和完善,打破“政策碎片化”僵局。我国流动儿童群体及其问题的产生和出现,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不平衡而导致的社会结构失调,社会功能弱化。但就目前的状况和形势,从改革我国不协调的经济结构上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若改革过快,必将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动荡和混乱;但流动儿童问题迫在眉睫,因此,要想彻底解决根源问题,需要在逐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辅

以补偿性的政策支持,双管齐下,才能真正解决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补偿性的政策支持,就是要完善国家对流动儿童的政策扶持体系,构建流动儿童政策保护的立体框架,避免政策“碎片化”的趋势。具体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首先要符合国家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即相关的政策基础和政策范围必须在统一规制的法律基础、统一搭建的制度框架、统一制定的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和扩展,再实现逐步延伸;二是政策制定的内容要更加注重可对流动儿童的环境缺失构成替代和支持作用的社会性资源的发掘和培养,以统一的国家政策为导向,通过这些社会性资源来帮助、引导流动儿童或家庭了解、熟悉国家政策,激发他们的意识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有充分发挥自己资源和优势解决问题的信心;三是政策制定的各主体要建立高效的协商和整合机制,即政府与各部门之间要达成密切的配合与支持,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监督政策的落实,保证公平性,为流动儿童平等享有资源提供政策保障。

第二,大力推进社会事业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自古以来,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还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核心的东方国家都比较重视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个国家推行社会福利及社会事业的目的和出发点存在差异,但凭借其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大力推行社会事业,提高福利水平俨然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作为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一种新模式,社会工作的潜力不容忽视。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24];同时,它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这一最终目标。因此,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来构建流动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

虽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社会服务体系,但专业的社会工作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且起步较晚,因此,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今天,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专业的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本土化的压力,并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社会服务空间,它将嵌入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框架之中开展专业服务^[24]。因此,社会工作要想在嵌入中获得发展,就必须在专业发展和服务成效等方面做出成绩,其中专业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专业本身,还应体现在其专业价值、伦理规范、技术方法等逐步向行政领域的扩展上,然而这些都必须以相关制度和政策支撑为前提,因此下文就从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及服务成效两方面来探讨应有的政策框架。

其一,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方面。首先,相关政策需加强文化引导:我国的政策架构应纳入对文化要素的考虑,并鼓励社会工作进行基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提炼和创新,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其次,优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加强对社会工作教育培训的资金扶持力度,优化高校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并对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投入实务社会工作领域给予政策鼓励,这样一来,他们既接受过系统专业的理论学习,又具备实际的实务经验,使得能动的反思和总结极具效率,从而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最后,释放社会工作服务空间,实现政策松绑:目前的社会工作模式大多是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的项目来源主要是政府委托,这样一来,社会工作服务与行政性工作的交叉无可避免,一般是行政性期望影响

社会工作服务,如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开展以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社区工作站或街道办的行政要求的影响,社会工作无论是项目来源,还是服务过程,都缺乏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将不利于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因此,应制定相关政策为社会工作释放服务空间,支持其专业价值、伦理规范、技术方法向行政领域的渗透,让其在相对自由自主的环境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其二,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方面,重点是充分发挥各类资源优势。政府的政策制定应为社会工作服务的资源整合提供便利,降低资源使用门槛,帮助其充分发挥自身独特能力,提升服务成效,获得各界的认可,从而推动社会工作在内的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

总之,针对流动儿童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尤其是引入专业水平较高、发展迅速的社会工作模式,在社区、学校和家庭层面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同时,辅之以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支持,从各个方面优化流动儿童的社会服务供给,才会在流动儿童保护因素的构建以及问题的解决上更加得心应手。

四、结 语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应时而生,对于其子女来说,要么成为“留守儿童”,要么成为“流动儿童”。当前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持续流动已势不可挡,使得流动儿童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流动儿童问题的改善已成为当前我国应对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我国虽已认识到了流动儿童问题的严峻性,也出台了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但都属于“事后弥补”,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解决流动儿童问题。因此,本文基于复原力理论视角,对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流动儿童个体所具备的能力出发,构建保护性因素以形成对风险的制衡与抵消。本文重点强调了将流动儿童自身的赋权与外部环境系统的支持相结合,以塑造、培养其应对风险的正向品质和能力这一过程目标为重中之重,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为流动儿童“解困”。同时,在流动儿童宏观层面的保护因素的构建上,本文也提到了关于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政策取向,这对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解放式教育强调发掘人在知识、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潜能,协助个人体会制度上的不公平,并汇集个人及集体力量,创造公平的社会秩序。详见:甘炳光,梁祖彬.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235.

参考文献:

- [1] 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11,(6):67-74.
- [2] A.S.Masten & D.Coastworth.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8,(2):205-220.
- [3] 田国秀,邱文静,张妮.当代西方五种抗逆力模型比较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19.
- [4] Suniya.S.Luthar,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A Study of High-Risk Adolescents. [J].Child Development, 1991,(3):600-616.

- [5] 吴帆,杨伟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1,(6):90-99.
- [6] 马多秀.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生活方式的质性研究[J].江苏教育研究,2009,(28):16-21.
- [7] 刘震.关于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综述[J].法制与社会,2010,(1):192-193.
- [8] 陈丽,屈智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伤害发生状况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12,(3):332-335.
- [9] 纪颖,张炎,王倩怡.在校流动儿童健康风险研究评述[J].人口与发展,2012,(4):94-99.
- [10] 赵向利.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的实证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21):50-51.
- [11] 刘庆.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探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北京青年研究,2015,(1):73-78.
- [12] 栾文敬,路红红,童玉林,等.家庭关系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J].学前教育研究,2013,(2):27-36.
- [13] 曾守锤.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及其风险因素的研究[J].心理科学,2010,(2):456-458.
- [14] 王毅杰,史秋霞.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0,(1):90-96.
- [15] 陈美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格特征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5,(6):178-180.
- [16] 姚远,郭良春,杨变云.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少年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5,(9):50-55.
- [17] 邵雅利,傅晓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15.
- [18] 李倡平.均衡发展视域下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管理机制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2011,(12):10-13.
- [19] 高政.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教育探索,2011,(12):15-17.
- [2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赵霞,王磊.北京市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调查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7,(6):64-69.
- [21] 余益兵,邹泓.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特点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8,(4):78-83.
- [22] Maleolm Payne.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何雪松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 [23] 曾守锤.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困境、问题、优势及建议[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3-18.
- [24] 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5):128-140.

责任编辑:梁 雁

The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CHEN Shan, LI Qiyuan

(Management Academy,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 flows into the cities, and the 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amily-oriented" in modern society. Migrant Children are facing up stro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atus. Their City Integration falls into the situation of marginalization.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and taking the environment-individual strategic model a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by taking the major risk of health-safety, social intercourse,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into environment, analyze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material basis and value of family, living condition, school manage system, social policy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From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of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t proposes a view, i.e. starting from the two elements of traits and abilities of resilience to build the protective factors, which can check and balance even offset the risk factors. Specifically, it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the protection from the internal launch way---the micro level of migrant children's 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collective empowerment, and external launch way---the medium level of family function's recovery,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s support, and the macro level of improving system and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resilience; risk factor; protective factor; empowerment